

[首页 \(/\)](#) > [文章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71\)](#) > [学术探索 \(/index.php?m=home&c=List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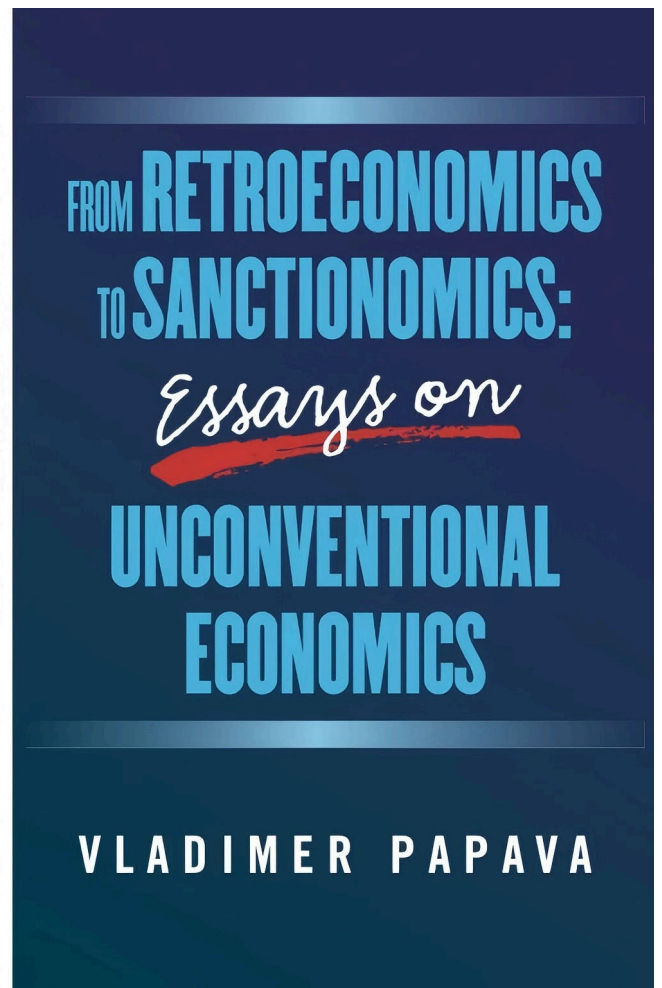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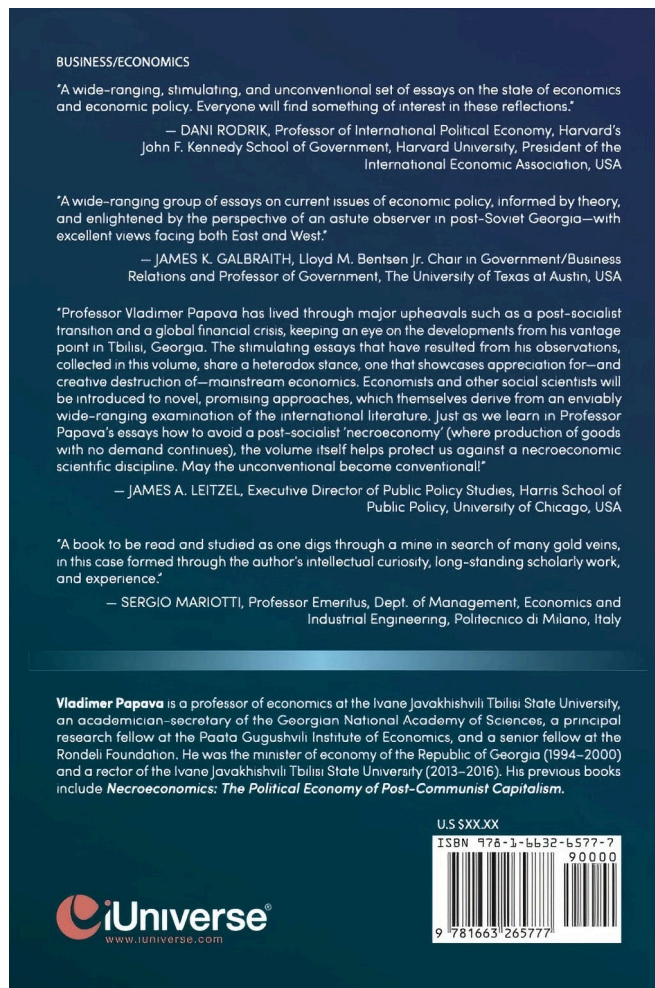
【成员作品】《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九）

2025-04-08

书籍介绍

我们很高兴代表CORE Academy—国际科学与人文学院成员弗拉基米尔·帕帕瓦（Vladmier Papava）教授向大家翻译及分享他的最新学术著作《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

本书是一本探讨经济学前沿问题的论文集，其研究范围突破了传统经济学框架的限制，聚焦于那些非平凡且极具争议的议题。书中不仅为当前经济学面临的危机进行了辩护，还提出了诸多克服危机的创新性建议。



第一部分：导论文章：非常规经济学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120&idx=2&sn=a321928eb5e7e156083e8d54700a1124&scene=21#wechat_redirect)
第二部分：ESSAY 2 论经济学危机及克服危机的一些方向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147&idx=2&sn=8e426e71e7a5ea3d636f274c303afb5e&scene=21#wechat_redirect)ESSAY 1
第三部分：ESSAY 3 论生产要素理论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147&idx=2&sn=8e426e71e7a5ea3d636f274c303afb5e&scene=21#wechat_redirect)ESSAY 2
第四部分：ESSAY 4 论市场平等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192&idx=2&sn=9e651074d2f969f7aafb79dd5e7173a9&scene=21#wechat_redirect)ESSAY 3
第五部分：ESSAY 5 论死亡经济学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192&idx=2&sn=9e651074d2f969f7aafb79dd5e7173a9&scene=21#wechat_redirect)ESSAY 4
第六部分：ESSAY 6 论全球金融危机，或“死亡经济学”与“僵尸经济学”的融合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449&idx=2&sn=6c76820ae74a5f1c18a87a9f0136abcb&scene=21#wechat_redirect)ESSAY 5
第七部分：ESSAY 7 论逆向经济学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568&idx=2&sn=a41717339fe97fef51b60a86b222e364&scene=21#wechat_redirect)ESSAY 6
第八部分：ESSAY 8 论追赶效应（全球主要国家危机后经济增长的案例研究）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712&idx=2&sn=7476fb68d1dff6cf76bbe0424183310&scene=21#wechat_redirect)ESSAY 7



ESSAY 8

Catching Up and Catch-Up Effect: Economic Growth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8.1 Introduction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l a country chooses to implement is very important for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is the challenge primarily faced by countries with developing economies that place the process of increasing their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one of their main goals to advance to the category of countries with developed economies. This problem is quite relevant for the relatively new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as well, including Bulgaria, the Czech Republic, Croatia, Estonia, Hungary, Latvia, Lithuania, Poland, Romania, Slovakia, and Slovenia. According to the established terminolog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s the geographic term for the group of these countries. For the purposes of our study, however, their geographic location is not as important as their economic (and gene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origins, including their economic past (meaning the command economy and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To broaden the scope of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U in general with Europea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this study also includes six Eastern

* Essay 8 is based on Papava (2018a, 2018b, 2018c, 2018d, 2020).

ESSAY 8

追赶与追赶效应：后共产主义欧洲的经济增长

8.1 引言

一个国家选择实施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些国家将提高经济水平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以跻身发达国家之列。这一问题对于欧盟（EU）相对较新的成员国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包括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根据既定术语，中东欧是这些国家的地理称谓。然而，在我们的研究中，它们的地理位置不如其经济（以及总体社会和政治）起源重要，包括它们的经济历史（即计划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

为了扩大欧盟与欧洲后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比较范围，本研究还包括六个东部伙伴关系（EP）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这些国家也是后共产主义国家。

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和欧洲议会成员国有着共同的经济（而不仅仅是经济）历史。更具体地说，这些国家（以及其他任何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实行了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在共产主义体制和计划经济崩溃后，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被迫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在制造业）无法生产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因此，在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僵尸经济”（Papava 2002），其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对僵尸企业的支持（见论文4）。

需要注意的是，在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前苏联成员国中，投资（并且这种趋势仍在继续）主要集中在进口旧技术和过时的技术，而不是高科技和尖端技术，这促进了这些国家整体技术的落后。因此，形成了一个复古经济（Papava 2017a, 2017b）。

分析表明，EP国家的经济增长性质在许多方面与前苏联国家的经济增长性质不同（e.g., Incaltarau et al. 2022）。

对于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以及整个欧盟而言，向基于知识经济的创新发展迈进是其特征（Berulava, Gogokhia 2016; Burduli and Abesadze 2017），这一观点在《里斯本战略》中有所阐述（Copeland, Papadimitriou, eds. 2012）。从这个角度来看，了解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验对欧洲伙伴国有多大借鉴意义，是非常有趣的。

第八篇论文的目的在于分析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所采用的经济增长模型，并将其应用于欧洲议会成员国（如适用）。我们还将尝试找出具有非共产主义历史的欧盟成员国与具有共产主义历史的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量级差异（Papava 2018a, 2018c, 2018d, 2020）。

8.2 关于经济增长模型

经济学领域存在多种经济增长模型（Acemoglu 2009; Barro, Sala-i-Martin 2004; Hudson 2015; Weil 2005）。根据一种现代分类，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Hudson 2015, 34-35）：

1. “前沿增长”是那些创造性新产品和基于新技术的新生产（应该指出的是，除了使用“前沿”一词，还可以使用“勇往直前”[Abramovitz]或“领先一步”[Gottinger 2005])的国家的特征。
2. “搭便车增长”是那些出口石油或食品产品的国家的特征，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这些产品的供应。
3. “追赶式增长”是那些以最低支出使用现有技术的国家的特征，以便它们能够向高收入国家出口产品。

很难同意给定的追赶定义，因为现有技术可能根本就包括不了尖端技术；没有这些技术，就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Matthews 2006, 314），韩国的经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Kim 1997）。因此，追赶不仅意味着基于现有技术的增长，还应包括尖端技术的增长（Abramovitz 1986; Matthews 2006）。

众所周知，追赶本身有助于经济发达的国家与经济仍处于发展中的国家之间的融合(Korotayev等人，2011年；Lim和McAleer，2004年)。

追赶模式的目标是让一个相对经济落后的国家能够赶上那些处于顶端的国家。该模式基于为自身发展寻找资源，其中原则性的教育体系改进非常重要，同时还需要促进科学和工程研究(Aslund, Djankov 2017,143-145)。这是为了使高技能人员能够利用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并成功地使用这些技术，积极参与到这些技术的创造过程中。

根据赶超模式，各国发展经济部门，这些部门创造更多的附加值，并促进这些特定经济部门的生产产出的出口扩张。

落后模型(Abramovitz 1986; Dunford, Smith 2000; Gottinger 2005; Kim 2007; Nassif et al. 2013; Record et al. 2018; Stokey 2012)与追赶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促进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化，而不是趋同。

当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产品的生产在国家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时，我们就会出现落后趋势(Nassif et al. 2013)。

众所周知，经济的去工业化(Rowthorn, Wells 1987)导致追赶速度放缓，在最坏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向落后模式转移(Palma 2005; Rowthorn, Ramaswamy 1999)。

落后模型必须与上述搭便车增长模型区分开来，因为根据前者，经济增长是由现有非尖端技术的最大使用量决定的；而后者则认为经济增长是基于石油产品和/或食品产品的出口。理论上，落后模型和搭便车增长模型可以共存。

要从落后模式转向追赶模式，人力资源至关重要。更具体地说，这涉及到那些必须成为追赶过程主要创造者的专家。通常，他们必须在以尖端技术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接受教育(Kim 2007)。他们的角色对于国家教育和科学体系的创建和发展至关重要，这样国家才能利用自身资源转向追赶模式。



8.3 从“新组合”和“创造性破坏”到“组合增强”

约瑟夫·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对经济发展的解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模型。更具体地说，熊彼特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实施“新组合”的过程(Schumpeter 2012, 139)。这意味着创造新的生产方式、新的服务和新的生产手段，开拓新的市场和原材料供应来源，并进行新的产业组织(Schumpeter 2012, 66)。

乍一看，人们会认为实施一项创新只需重新分配资源以利于创新者。然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具体来说，熊彼特恰当地指出，新的组合通常与旧的并存(Schumpeter 1987, 219)。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观点与熊彼特在其另一本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提出的经济动态理论相矛盾。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过程，即一种几乎不断从内部摧毁旧结构并创造新结构的经济变革过程(Schumpeter 2008, 83)。这种矛盾的本质在于，根据创造性破坏理论，新的组合只能取代旧的组合。然而，在上述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并未排除在旧组合存在的情况下，新的组合使用主要为新资源而非旧组合已使用的资源时，仍能产生新的组合的可能性(Tatarkin et al. 2017, 7-8)。

通常情况下，真相必须介于两者之间，而这种“中间”的性质在于新的组合和创造性破坏发生在同一经济空间内；再次强调，它们并存。当一些旧的组合通过创造性破坏过程被新的组合取代时，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而其他旧的组合则继续存在，不是被取代，而是见证着新组合在其旁的诞生。

在现代，当诸如空间探索、核工业和电子等新的经济部门正在成功运作时，旧组合所使用的资源的很大一部分对新组合来说甚至毫无用处(Sukharev 2013,9)。

显然，鉴于经济现实，旧技术和新技术如上所述并不少见地共存，这意味着它们同时存在。通常，这种新旧技术的共存还受到一个事实的保证，即这些技术存在于一个国家经济的不同部门（或子部门），这主要是由于生产资料因技术和技术差异而具有不同的内容。

应当指出，根据国际经验，经济危机会阻碍技术和技术的发展(Sukharev 2013, 2)，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在经济危机中都受到最严重的打击(Sukharev 2013, 6)。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排除这样的事实：为了克服危机并确保经济在危机后的增长，必须特别重视旧组合(Sukharev 2013, 9)。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实施新组合所需的资源更加有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完全排除，实施新组合至少也难以实现。

“组合性增强”概念也必须被视为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延续，根据该理论，组合性增强是一种新的组合，不需要旧组合的资源，因为它基于定性上全新的资源（Sukharev 2013,9; 2014）。

鼓励组合式增强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拒绝创造性破坏；相反，在可能的情况下，必须用新的组合取代旧的组合。

因此，在可能的范围内，促进用新技术取代旧技术或创造性破坏，以及刺激组合性增长，必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

如果我们采纳《经济变迁的进化理论》（Nelson, Winter 1982）的建议，政府的经济政策一方面需要促进组合增殖的过程，另一方面则需创造一个环境，使创造性破坏过程不会遇到人为障碍，以刺激经济发展。对于后者，政府应采取积极且复杂的措施（如教育系统的质量提升、预算对新技术的刺激、完善破产法律规范等）（Papava 2017b）。

值得注意的是，从理论上讲，通过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实现赶超可以最快地实现；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支持旧组合的力量（更具体地说，是支持它们的政治力量）。

在组合增强的情况下，这种对立较弱，因为旧组合和新组合可以在一个国家经济的不同部门（或子部门）中共存。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旧组合的创造性破坏，政府需要促进组合增强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实现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这本身将有助于克服基于旧组合存在的“技术陷阱”（Balatskiy 2012,57）。

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让我们记住，技术陷阱是指当一家公司倾向于使用较旧、效果较差的技术，即使有可能转向更新、更现代的技术时（Balatskiy 2003）。技术陷阱本身是由公司优先解决短期而非长期任务的情况造成的。短期利益优先于长期利益，主要是由于政治、法律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Balatskiy 2012）。为了摆脱技术陷阱，采取一系列复杂的步骤至关重要。具体来说，首先，政府必须促进社会经济乐观情绪的形成（Balatskiy 2010）。乐观者渴望获得最大利益，已经习惯了高风险的想法，而悲观者则试图在可接受的保障收益水平下最小化风险（Keselman, Matskevich 1998）。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本身就能促进经济乐观情绪的提升。因此，要克服技术陷阱，重要的是实现“技术飞跃”，这可以通过政府促进组合增强过程来实现。

在政治、法律和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企业倾向于解决短期而非长期任务，因此营造经济乐观情绪对于这些国家非常重要（Balatskiy 2012）。这表明，政府促进组合增强过程对于这些国家尤为重要。

8.4 创新的国家体系与极度落后

如今，普遍的看法是，后共产主义国家已经完全克服了其共产主义过去的困难遗产，表现为一种死气沉沉的经济，而复古经济仍然是经济的主要动力部门。然而，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了欧盟成员国准备期的严重影响。具体来说，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它们有目的地重组了各自的经济，旨在减少企业支出，并对生产过程进行质量更新，以符合欧洲和国际质量评估标准（ISO，国际标准化组织）（Vlaskin, Lenchuk 2005,66）。因此，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衰退不再是欧盟的主要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欧盟大多数后共产主义成员国（当时也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除外）拥有相当重要的科技体系，主要集中在军事工业综合体的需求上。当我们谈论这些国家最初的创新潜力时，首先应考虑的是高素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存在，他们参与了这一科技工作（Abukhovich 2011）。

这本身使得这些国家特别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航空航天、电子制造、电信及其设备生产以及化学和制药领域[Vlaskin, Lenchuk, 2005, 66]），甚至在它们成为欧盟成员国之前就吸引了跨国公司。这一点尤其需要强调，因为这些国家在加入欧盟前，国内市场仅限于其自身的外部边界，导致市场相对较小。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国内市场的规模较小，显著降低了在任何实际经济部门投资的吸引力。我们还应强调，除了国内市场规模小之外，上述后共产主义国家与欧盟直接接壤，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这些国家对西欧投资者的吸引力(Shah 2002,6)。

依赖于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预期，将中国融入庞大的经济空间的想法是错误的。

欧盟足以让新加入的成员国采用追赶型增长模式（Dunford, Smith 2000,192）。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高素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资比西欧同行低，名义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比例明显有利于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

正是这些国家的初始创新潜力所引起的投资吸引力，超过了这些国家国内市场相对较小所带来的问题，使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变成了主要生产国而不是消费国。

在这些成员国（特别是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尤其是匈牙利），西欧资本对经济的参与非常重要（Vlaskin, Lenchuk 2005,69）。另一方面，这类资本主要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吸引而来。这一过程还得到了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的推动。

因此，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实现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出口潜力的扩大。同时，几乎无法说这些国家还成功创建了自己的创新体系，因为从前的计划经济继承下来的创新潜力实际上已被跨国公司为了自身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所“耗尽”（Vlaskin, Lenchuk 2005,66）。

在跨国公司主导的条件下，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几乎没有（如果有）资源来发展创新的国家体系，因此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完全依赖于发达国家，包括西欧国家（Vlaskin, Lenchuk 2005,66）。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创新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这一点从美国创新活动失败率估计约为90%的事实中可见一斑（Mikul'skiy, ed.2002,82）。

欧盟在创新方面落后于美国和亚洲部分国家（Aslund, Djankov 2017,133-135）。如今，欧盟（以及卢森堡、瑞典、芬兰、德国、丹麦和荷兰）有追赶的真正潜力（Aslund, Djankov 2017,135）。

由于一些西欧国家正在进行的组合增强过程，促进基于尖端技术的公司发展，并将传统制造业，即所谓的旧技术产业，转移到欧盟后共产主义成员国（以及某些西欧国家）已成为这些国家的确切优先事项。换句话说，在单一经济区的情况下，如果组合增强过程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内各个部门或子部门中新旧组合的共存，那么较旧的组合大多被转移到了后共产主义成员国，而一些西欧成员国则主要优先发展尖端技术。

因此，在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的应用研究大多集中在西方和一些亚洲国家创造的技术的适应上。这本身促进了少数剩余的高素质科学家和工程师从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迁移到西欧成员国或美国及发达亚洲国家，以寻求更高的薪酬。

此外，为了更好地适应其他国家创造的技术，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越来越依赖于从这些国家进口一些原材料、机械和技术。

综合考虑所有这些条件，可以推断出后共产主义（但不仅仅是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中明显存在逆向经济现象。

不幸的是，在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创新的国家系统发展得较为薄弱（Vlaskin, Lenchuk 2005），因此这些国家的特点不是追赶，而是落后。当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明显在技术上落后于美国以及一些亚洲和西欧国家的标准时，这种现象尤为突出。

欧盟创新产品单一市场的创建对于欧盟成员国的追赶过渡非常重要（Aslund, Djankov 2017,139-141）。

从上述类型的经济增长来看，实际上在EP国家中找不到任何一种，这是由于明显原始的计划。

不幸的是，长期贫困和缺乏发展出口潜力是EP国家经济的特征。

我认为，EP国家特有的经济增长类型可以被评估为极度落后（Papava 2018b），不幸的是，这些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几乎不存在（充其量处于极其初级的状态），不仅使用创新技术几乎不可能，就连模仿——即复制和使用现有技术——也几乎无法实现。

考虑到上述所有因素，欧洲议会成员国有必要制定战略，使它们能够从极度落后走向迎头赶上，即使这意味着要经过一段落后作为中间步骤。



8.5关于追赶效应问题

为了更客观地评估经济增长指标，我们将使用世界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开始前的数据，以及尽可能远离该时期的同期数据。具体来说，分析将针对2006年和2016年进行。

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尽量排除了全球金融危机对研究中各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应指出的是，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以国际美元计算，考虑了购买力平价（PPP）。

如第7章第7节所述，指标(r)用于衡量经济增长，它表示实际GDP变化率（即报告期（Y1）的GDP与基期（Y0）的GDP之差或 $\Delta Y = Y_1 - Y_0$ ）与实际基期GDP的比率：

$$r = \frac{\Delta Y}{Y^0} .$$

这个指标被经济学家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并观察该指标随时间的变化。使用这些指标，无法比较两个或多个国家。更具体地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回报递减，以及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可能实现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见论文7）。这一事实被称为追赶效应（Mankiw 2004, 546–547）。

如果我们考虑欧盟后共产主义成员国以及欧洲议会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率（WB 2023a），很容易注意到，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尤其是在2006年全球危机之前，它们的经济增长明显高于欧盟（见表8.1）。

表8.1 2006年和2016年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和欧洲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指标

No.	Countries	Indicators of		GDP per capita	
		Year		Year	
		2006	2016	2006	2016
	EU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1	Bulgaria	6.8	3.9	11,377.90	19,509.00
2	Croatia	4.8	3	16,934.70	23,731.80
3	Czech Republic	6.9	2.6	23,790.20	35,139.60
4	Estonia	10.3	2.1	19,269.10	29,620.00
5	Hungary	3.9	2.2	18,308.50	26,996.80
6	Latvia	11.9	2.1	15,761.60	25,932.50
7	Lithuania	7.4	2.3	16,494.00	29,966.10
8	Poland	6.2	2.9	15,150.90	27,922.70
9	Romania	8.1	4.6	11,694.30	23,626.40
10	Slovak Republic	8.5	3.3	18,875.50	30,706.10
11	Slovenia Eastern Partnership Countries	5.7	3.1	25,778.00	33,421.20
12	Armenia	13.2	0.2	5,607.60	8,849.90
13	Azerbaijan	34.5	-3.1	9,830.20	17,282.20
14	Belarus	10	-2.6	11,389.60	18,090.70
15	Georgia	9.4	2.8	4,985.30	10,024.00
16	Moldova	4.8	4.1	3,190.10	5,342.60
17	Ukraine	7.3	2.3	7,184.20	8,271.80
	European Union	3.3	1.9	29,783.10	39,838.20

根据表8.1以及追赶效应，实际上无法确定哪些国家在欧盟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追赶增长，哪些国家则处于尾随增长或落后。例如，阿塞拜疆在2006年实际经济增长率最高（34.5%），但这并不意味着阿塞拜疆一定实现了前沿增长。

表8.1中所列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不同，例如，后共产主义国家过去（有时现在也是如此）背负着“僵尸经济”(Papava 2002)（见论文4）。因此，由于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起步较晚（这源于它们的发展水平），它们更容易通过追赶效应实现高经济增长，而非后共产主义国家则不然。

经济发展水平通常通过人均GDP来评估。很明显，如果我们把欧盟成员国和非欧盟成员国进行比较，这个指标会有很大不同（见表8.1）（WB 2023b）。

因此，为了能够比较经济发展起点不同的国家的经济增长指标，有必要排除追赶效应，例如，可以通过使用基于比例重叠假设的方法来实现(Papava 2012,2014)（参见论文7的第7.4节）。

如果我们用N表示一个国家的人口，那么人均GDP(y)将是：

$$y = \frac{Y}{N}.$$

根据追赶效应比例重叠假设的本质，追赶效应的比例重叠系数 α_{ij} 显示了国家 i (y_i) 的人均GDP比国家 j (y_j) 的同一指标高出多少倍：

$$\alpha_{ij} = \frac{y_i}{y_j}$$

乍一看，最好选择人均GDP最高的国家（在我们的情况下是卢森堡）作为 i 国（或暂时称为基准国），这使得该国更难实现高水平的经济增长。需要注意的是，也可以选择其他任何国家的相关指标作为基准国，因为最终结果的比例（即调整后的经济增长指标）不会因不变性定理而改变(Papava 2016)（参见论文7的7.5部分）。

鉴于本研究的目标，选择欧盟的人均GDP(y)作为基准指标是合乎逻辑的。这样可以让我们比较欧盟后共产主义成员国以及欧洲议会成员国与欧盟自身的经济增长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为了实现本研究的目标，比例重叠系数（ α_j ）将被采用。

$$\bar{\alpha}_j = \frac{\bar{y}}{y_j}$$

这些系数见表8.2。该表中给出的参数显示了欧盟人均GDP与各个国家相应指标相比是高还是低多少倍。

表8.2 追赶效应的相对重叠系数（欧盟人均GDP与各国人均指标的比值）

No.	Countries	Years	
		2006	2016
	EU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1	Bulgaria	2.617627	2.042042
2	Croatia	1.758703	1.678684
3	Czech Republic	1.251906	1.133712
4	Estonia	1.54564	1.344976
5	Hungary	1.626736	1.475664
6	Latvia	1.889599	1.536227
7	Lithuania	1.805693	1.329442
8	Poland	1.965764	1.426732
9	Romania	2.546805	1.686173
10	Slovak Republic	1.577871	1.297403
11	Slovenia	1.155369	1.192004
	Eastern Partnership Countries		
12	Armenia	5.311203	4.501542
13	Azerbaijan	3.029755	2.305158
14	Belarus	2.614938	2.202137
15	Georgia	5.974184	3.974282
16	Moldova	9.336102	7.456706
17	Ukraine	4.145639	4.816146
	European Union	1	1

考虑到国家j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 r_j ，而欧盟与国家j的经济发展水平之比为 a_j ，则可以得出，考虑到追赶效应的比例重叠假设，国家j的调整后经济增长率（ r^*_j ）将为：

$$\bar{r}^*_j = \frac{r_j}{\bar{a}_j}$$

换句话说， r^*_j 并不显示国家j的实际经济增长，而是显示其调整后的指标，考虑了欧盟与国家j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调整后的经济增长数据见表8.3。

表8.3 调整后的经济增长数据

No.	Countries	Years	
		2006	2016
	EU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1	Bulgaria	2.597773	1.909853
2	Croatia	2.729285	1.787114
3	Czech Republic	5.511595	2.293351
4	Estonia	6.663904	1.561366
5	Hungary	2.397438	1.490855
6	Latvia	6.297633	1.366986
7	Lithuania	4.09815	1.730049
8	Poland	3.153989	2.032618
9	Romania	3.180456	2.728071
10	Slovak Republic	5.387006	2.543542
11	Slovenia	4.933489	2.600663
	Eastern Partnership Countries		
12	Armenia	2.485313	0.044429
13	Azerbaijan	11.38706	-1.34481
14	Belarus	3.824182	-1.18067
15	Georgia	1.573437	0.70453
16	Moldova	0.514133	0.549841
17	Ukraine	1.760887	0.47756
	European Union	3.3	1.9

如果将表8.3中调整后的经济增长数据与表8.1中的实际经济增长数据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

根据调整后的经济增长指标，为了清晰地想象欧盟、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和欧洲议会成员国之间的数量差异，建议以图表形式展示这些指标。为此，需要将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欧盟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排名。为此，我们将用各自欧盟指标（β_j）除以各国的人均GDP。

$$\bar{\beta}_j = \frac{y_j}{\bar{y}}$$

适当的指标见表8.4。

表8.4 各国人均GDP与欧盟同一指标的比率

No.	Countries	Years	
		2006	2016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1	Bulgaria	0.382025	0.489706
2	Croatia	0.568601	0.595705
3	Czech Republic	0.798782	0.882058
4	Estonia	0.646981	0.743507
5	Hungary	0.614728	0.677661
6	Latvia	0.529213	0.650946
7	Lithuania	0.553804	0.752195
8	Poland	0.508708	0.700903
9	Romania	0.392649	0.593059
10	Slovak Republic	0.633765	0.77077
11	Slovenia	0.865524	0.838923
	Eastern Partnership Countries		
12	Armenia	0.188281	0.222146
13	Azerbaijan	0.33006	0.43381
14	Belarus	0.382418	0.454104
15	Georgia	0.167387	0.251618
16	Moldova	0.107111	0.134107
17	Ukraine	0.241217	0.207635
	European Union	1	1

为了在图表中表示各国调整后的经济增长数据及其经济发展水平，我们将以各国的人均GDP与欧盟 β_j 的同一指标之比作为横轴，以基于经济增长比例重叠假设（ r^*_j ）调整后的数据作为纵轴。在下面展示的每张图表中，横轴上的1.0对应于欧盟的人均GDP，根据这一标准，所有国家的相同指标进行排名。对于2006年的图表，我们在纵轴上看到的是欧盟的经济增长率（3.3），而对于2016年则为（1.9）（见表8.1和8.3）。

在排除了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图8.1和8.2）以及欧洲议会成员国（图8.3和8.4）的追赶效应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

图8.1 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调整经济增长率及其与欧盟2006年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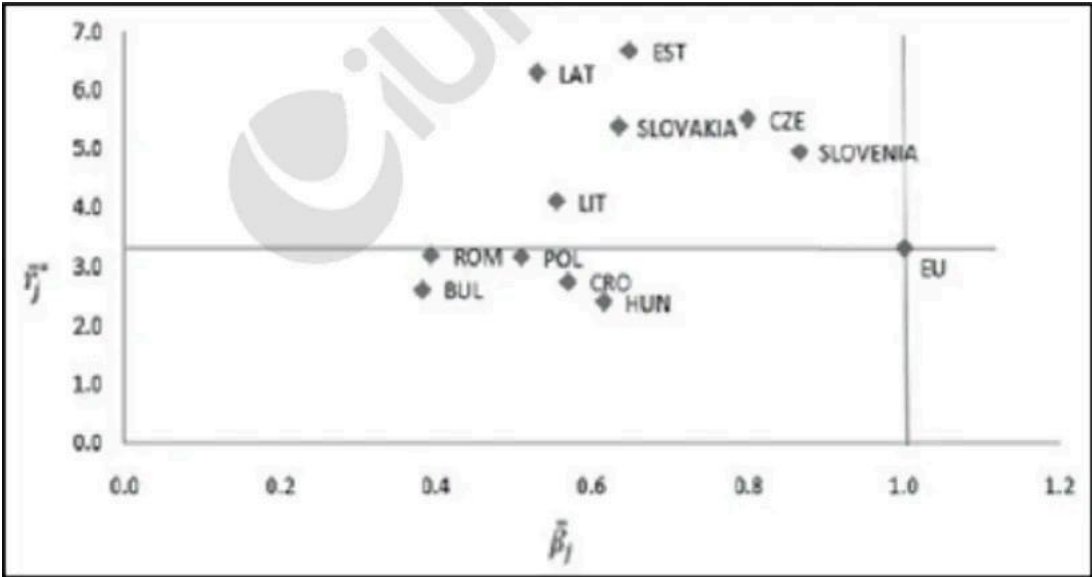


图8.2 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调整经济增长率及其与欧盟2006年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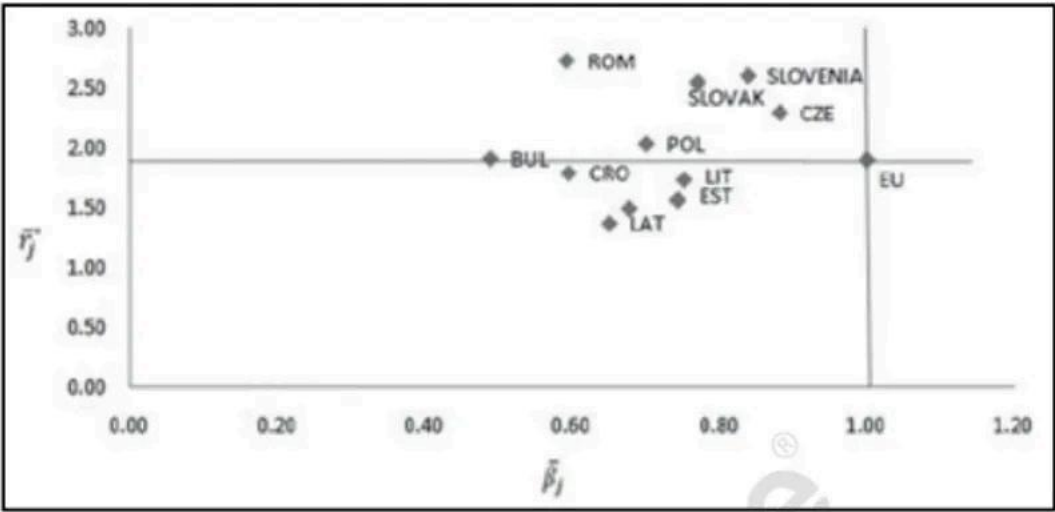


图8.3 2006年EP国家的调整后经济增长及其与欧盟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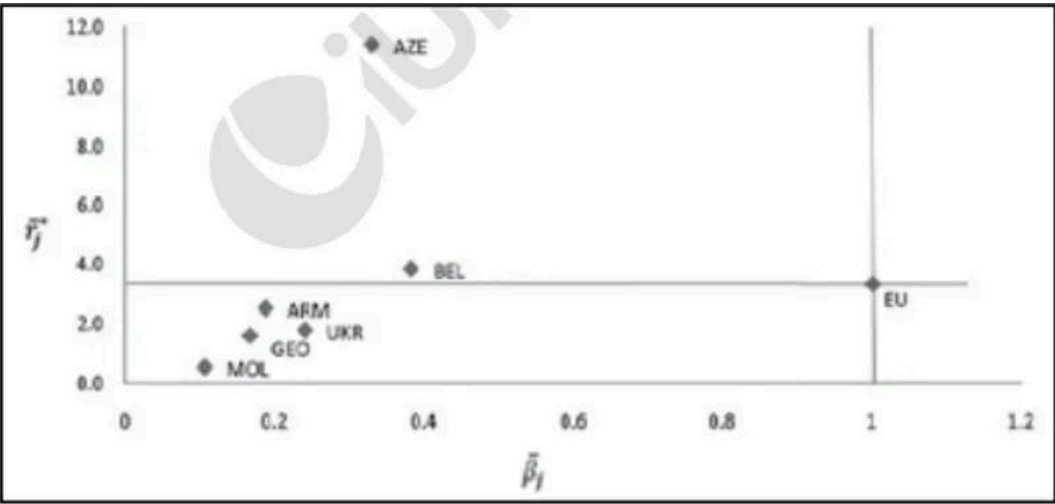


图8.4 2016年EP国家的调整后经济增长及其与欧盟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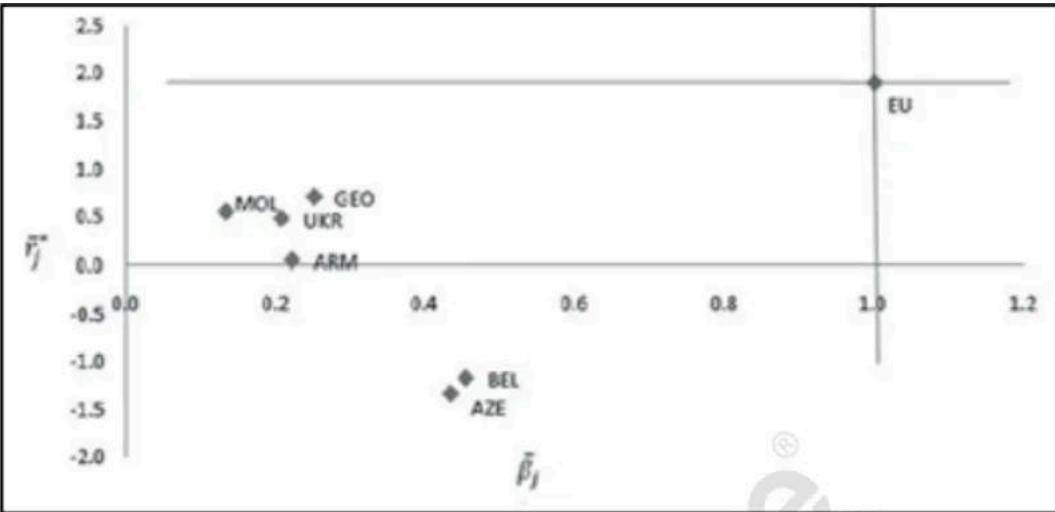


图8.1和8.2清楚地表明，在十年的时间跨度内，即2006年和2016年，只有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这三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欧盟成员国实现了明确且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其他国家则没有表现出这种稳定性，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经济增长指标明显落后。

要诊断上述国家所经历的经济增长类型，仅仅排除追赶效应是不够的；有必要使用一整套指标（工发组织2005年）。此外，最好花些时间让经济增长趋势更加清晰。同样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应排除全球或区域经济危机时期的点，以免危机扭曲所考虑的经济增长类型的形象。

在这方面，欧洲议会成员国的调整后的经济增长指标更令人担忧（见图8.3和8.4）。

2006年和2016年，EP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严重落后于欧盟指标。

即使排除了2006年的追赶效应，只有阿塞拜疆因其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而被单独挑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该国可以被描述为追赶型国家。

如果我们记住阿塞拜疆的经济特点是生产和出口石油及天然气——在这方面，2006年也是一个特殊年份(Papava等，2009,50)——那么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类型是搭便车增长。世界市场上油价的下跌对阿塞拜疆经济造成了相当痛苦的影响，这是2016年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欧洲经济区国家根本不存在追赶现象，不幸的是，它们的经济增长要么落后（甚至可能是极度落后），要么是搭便车增长。要分辨哪种情况，有必要研究各个经济体的主要特征。

8.6 结论

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以及整个欧盟都参与了里斯本战略的实施，该战略旨在创建一个知识经济。由于赶上战略将确保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融合，因此赶上战略的使用对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极为重要。

另一方面，落后则会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化，因为在这种模式下，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商品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根据实践，事实是，现代技术和旧技术常常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经济的不同部门或分部门。

如果考虑到现代的现实，组合性增强概念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延续。

近十年的欧盟入盟准备对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被用于对各个经济体进行结构调整，以减少生产支出和定性改革生产过程。

20世纪90年代起，欧盟开始投资其边境附近或相邻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更具体地说，这些国家的高素质科学家和工程师所需的相对较低工资，与西欧相比，对跨国公司有利。通过这种方式，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得以实现较为稳定的经济增长，并扩大出口潜力。

不幸的是，这些国家未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创新体系，因为跨国公司只根据自己的利益利用了这些国家从指令经济中继承的创新潜力。

组合增强过程在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中以一种特殊方式显现出来，当旧技术和新技术在不同行业或子行业中共存，并且在地理上相距甚远时。新技术主要集中在一些西欧和其他发达国家，而较老的技术则大多留给了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

因此，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对来自某些西欧国家（以及总体上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特别是机械设备的依赖正在增加。显然，这些国家的经济是维持逆向经济并以这种方式实施组合增强过程的良好多边形。

对于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来说，落后比追赶更有特点，这是这些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发展薄弱的 unfortunate 结果。

排除追赶效应对对于对中欧和东欧那些曾经有过共产主义历史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进行定量评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可以采用基于比例重叠假说的方法。

排除追赶效应后，在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展现出最令人鼓舞的经济增长。遗憾的是，欧洲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类型不尽如人意。这些国家的特点是落后（或更准确地说，极度落后）以及跟随型增长。

为了更精确地研究各国经济增长类型，在排除追赶效应后，有必要使用一种特殊的指标体系。

关于作者

弗拉基米尔·帕帕瓦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拥有丰富的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经历。他是Core Academy-国际科学与人文学院Fellow（社会科学部）与科睿研究院学术委员，同时也是第比利斯国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帕帕瓦教授还担任格鲁吉亚国家科学院院士兼总秘书长。

帕帕瓦教授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应用经济学、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以及地理经济学。他创立了“死亡经济学”的概念，作为后共产主义经济转型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逆经济学”理论，用以解释技术落后的经济现象。此外，他还建立了拉弗-凯恩斯综合模型，并制定了消除经济增长指标中的追赶效应的方法。



Vladimer Papava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s

Economist

vladimer.papava@tsu.ge

FCAcad; Academician-Secretary, Georgia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Full Professor of Economics, Ivane Javakishvili Tbilisi State University; Principal Research Fellow, Paata Gugushvil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enior Fellow, Rondeli Foundation

在政治生涯方面，帕帕瓦教授曾担任格鲁吉亚经济部长，积累了丰富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经验。他还曾担任第比利斯国立大学校长，推动了学术研究和教育改革。他的研究不仅关注理论创新，还致力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如全球化转型、大规模经济制裁的经济外部性，以及中高加索-亚洲地缘经济问题。

◆

Reference List

Ahearne, A. G., Shinada, N. (2005). “Zombie Firms and Economic Stagnation in Jap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2(4): 363–381.

Anderson, R. E. (2004). *Get Out of the Way: How Government Can Help Business in Poor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Baker, D. (2023a). “Dealing with Patent Monopolies and High Prices.” *Eurasia Review*,

往期推荐

- 【综合回顾】CORE Academy 一带一路全球合作伙伴项目：高加索三国行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UxNDY2MQ==&mid=2247488671&idx=2&sn=97e8a1b625568bac8b0c4ab30a63242&scene=21#wechat_redirect)
- 外国院士：全球化经济安全是首位，其次是“全球本地化”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UxNDY2MQ==&mid=2247486477&idx=1&sn=e90f4f894035294aa57576b0fa7e9262&scene=21#wechat_redirect)
- 特朗普的学术绞杀：常春藤在颤抖，教授们逃往何处？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UxNDY2MQ==&mid=2247490673&idx=2&sn=765061b03762c7b8701cdcbdaabb7f2&scene=21#wechat_redirect)
- 国际经济学家、原格鲁吉亚经济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帕瓦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UxNDY2MQ==&mid=2247488775&idx=2&sn=e1a79ba773bbe3a615404ce68c984796&scene=21#wechat_redirect)



科学引领 睿智探索

求是客观 经世致用

Ke Rui Academy

关于我们

- >

[科睿介绍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89\)](/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89)
- >

[文章投稿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91\)](/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91)
- >

[交流合作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92\)](/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92)
- >

[新闻动态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69\)](/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69)
- >

[成员申请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90\)](/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90)
- >

[工作机会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70\)](/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70)

联系电话

0755-86965936

联系邮箱

academy@kerui.org

